

农村流动数字电影市场(2020年5月11日—5月17日):
《2020年农村电影放映设备维护指南》进行卫星传输

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部统计,目前全国已成立农村数字院线333条,本周50条院线订购了近500部影片,累计超90000场。截至2020年5月15日,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的数字电影交易平台显示共有可订购影片近4000部,其中2019年以来出品的影片约170部。

故事片方面,本周主旋律影片《周恩来回延安》和《红星照耀中国》表现突出,合计被订购6000余场。《周恩来回延安》以1973年6月身患重症的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的历史事件为叙事中心,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血肉相连、不忘初心、不懈奋斗的伟大精神;《红星照耀中国》则是《国家电影局关于开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展映展播活动的通知》中第一部和农民观众见面的重点影片,八个月时间共有161条院线订购累计接近50000场,目前依然深受广大观众和院线青睐。

科教片方面,《可可小爱之疾病预防》、《可可小爱之安全防范》、《可可小爱之中华美德》、《可可小爱之知法懂法》、《可可小爱之社会关爱》系列影片占据科教片排行榜前列,五部影片合计订购11821场。该系列以清新时尚、活泼可爱的动漫宝贝可可和小爱,来演绎疾病预防、中华美德、社会关爱等爱心公益主题故事,受到广泛好评。此外,为更好地服务全国广大农村院线,针对疫情期间电影放映设备易损坏、电影放映员亟需放映设备技术学习培训等实际需求,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组织推出了教学宣传片《2020年农村电影放映设备维护指南》,本周该片共有18条院线累计订购了7000余场,成为本周影片订购冠军。

本周开启影片卫星传输工作

根据全国农村院线需求,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于5月13日-14日通过电影数字拷贝卫星传输平台24小时不间断传输了教学宣传片《2020年农村电影放映设备维护指南》。

《2020年农村电影放映设备维护指南》由资深农村电影放映技术团队进行拍摄和讲解,针对大家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放映设备开机维护、放映前准备工作、主电源打开设备不供电、视频输出不正常、音频输出不正常、播放中死机或卡顿、播放中投影突然断电等技

术难点和处理方法进行了梳理和权威解答。

陕西、河北、内蒙古
开展设备巡检及培训工作

目前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阶段,各地院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继续稳步推动设备巡检及培训等准备工作。

5月13日,陕西汉中院线南郑服务站对全体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员进行了公益电影复工复映前设备维护培训活动。在培训过程中,服务站技术人员现场传授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前的放映场地选择、设备架设固定、设备用电安全等各项准备工作以及放映过程中的设备供电、音视频输出、播放死机或卡顿、播放中投影突然断电等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使全体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员增强了放映业务知识技能,为即将开展的全区农村公益电影复工复映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

5月14日,河北保定市锦秀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设备巡查暨放映员培训工作正式拉开帷幕。为进一步增强院线公司服务职能,院线组织放映员共同学习传输影片的正确使用方法,利用蓝牙读卡器给影片授权的注意事项。每个放映员利用手机和电脑亲手操作,很快便做到了熟练掌握。目的就是做到放映员足不出户,即可完成影片的下载及场次授权工作,为放映员创造最大的便利。

内蒙古包头院线组织放映员在线上认真学习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网站微信公众号推出的《农村电影放映设备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网络课程,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放映技能。目前,包头院线已完成辖区60支放映队所有放映设备的巡检工作。对20套旧版飞达功放进行升级,增加了U盘、手机蓝牙的音乐播放功能,方便放映员映前暖场宣传。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网站编辑部每周推出《农村电影市场周点评》,欢迎各省市区电影管理部门、农村院线、影片发行方将近期影片订购情况、设备巡检运维工作、技术服务培训等工作信息及照片发给我们。《农村电影市场周点评》将在《中国电影报》、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刊发,并将选出优秀稿件推荐主流权威媒体刊发。投稿邮箱:dmcnews@dmcc.org.cn,来稿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及单位。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包头院线组织放映员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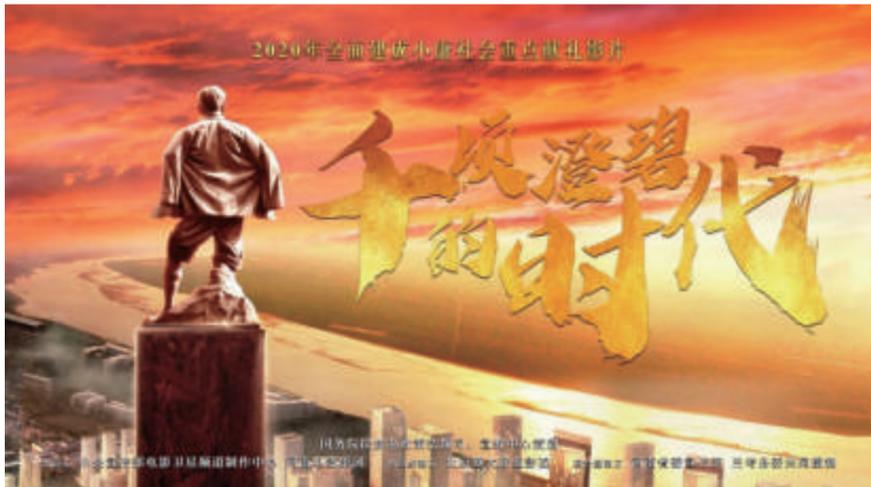
陕西汉中院线南郑服务站召开设备维护培训会



河北保定市锦秀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对放映员进行培训

电影频道出品《千顷澄碧的时代》
用光影书写“中国扶贫方法论”

■文/本报记者 林琳



多年以后,站在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拍摄现场的导演宁敬武,除了带这部影片内敛、静谧的艺术气质外,也许他自己也不曾想到,曾经在金融行业多年的工作经验,更是给这部讲述脱贫攻坚工程的影片带来了“金融扶贫”的元素。

《千顷澄碧的时代》,是一部热血、感人的故事片,是导演宁敬武、监制唐科、制片人周昀,以及全体主创,共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尝试解读“贫穷的本质”,更是对“中国扶贫方法论”的一次总结。

《千顷澄碧的时代》,这样一部以兰考县脱贫攻坚战为基础原型的影片,早在2016年底就开始了创意上的筹备。在距离2019年12月开机的这大约三年的筹备期里,制片团队不仅完成了还原搭建拍摄地脱贫前后的场景、制定道具服装等事无巨细的工作,更是经历了漫长且艰辛的剧本打磨工作。该剧本前后由三拨编剧团队进行创作,在故事发生地兰考采风、采访、收集素材,三年中多次往返,最长的一次在当地驻扎了三个月,直到开机前还习惯性修改拍摄剧本。

在导演宁敬武加入团队后,他提出将“金融扶贫”作为影片主线,以此把整个影片的故事、人物串联在一起的想法说服了监制唐科。在唐科心中,只有导演对“贫穷”有了社会学的认知,才能让影片更有深度。而制片人周昀同样认可宁敬武作品内敛、静谧且灵动的艺术气质。

时至今日,《千顷澄碧的时代》仍处在最后的后期制作阶段。在这约莫四年的光阴里,主创团队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回答了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要用什么方式展现这部电影,其中最想表达的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

为何要拍这样一部电影?

《千顷澄碧的时代》以兰考县脱贫攻坚战为基础原型,讲述了年轻的证监会干部芦靖生与县委副书记范中州、乡书记韩素云为代表的兰考各级干部相遇在中国脱贫攻坚战第一线,带领人民群众奋战三年,最终摆脱贫困的故事。

在唐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贫穷了半个多世纪的兰考,为什么能在三年内摆脱贫困,这三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有这样疑问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就连身为兰考人的周昀同样也在寻找答案。作为土生土长的兰考人,从小就深刻体会到故乡的贫穷。30多年前,有西方学者参观考察兰考后提出“灿烂的政治之花”为何结不出“丰硕的经济之果”之问。“至今我还记得父辈那一代人描述西方学者之间的尴尬和愤怒。”正因如此,周昀在面临《千顷澄碧的时代》时,比旁人多了一份复杂的个人情感。

如今的兰考不但摆脱了贫,还结出了“丰硕的经济果实”,兑现了三年脱贫、七年奔小康的承诺。新时代的兰考解决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数字人群摆脱贫困的壮举,在周昀看来,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电影、超越了常规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中国电影人应向世界讲好这个了不起的“中国故事”。

在金融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的唐科说《千顷澄碧的时代》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它绝不是一部单纯的好人好事或英雄模范的故事,它讲的是如何解决贫穷问题,如何让穷人活得更体面、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唐科认为,无论任何国家地区、哪种意识形态、怎样的宗教信仰,解决贫穷问题都是人类共同的目标。“我想通过这部影片把我们的经验和价值观分享给全世界。”

“摆脱贫困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事件,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是具有巨大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力量的事情。”在宁敬武看来,河南兰考的故事不仅具有典型性,更具有普遍性和象征意义。“影片中的兰考不仅仅代表这一地区,也代表黄河周边所有的区域。”

为何要采用全景式的表现方式?

对于《千顷澄碧的时代》这样一个重大题材的电影项目而言,采取“大题材小切口”的创作手法,不失为一种时尚且讨巧的做法。但唐科、宁敬武、周昀三人却坚持采取正面、全景式的叙事方式。

在三年多的准备期中,主创们越来越认识到,《千顷澄碧的时代》所承载的核心,让他们在表达上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以正面方式,用波澜壮阔的全景画卷呈现地处黄河流域兰考的前世今生。”

“这次史诗级的脱贫攻坚战役,它的复杂性、艰巨性,其中涉及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县乡村贫困各个层级,人物事件繁多。”在周昀看来,非全景式的表达不能对其全面展示。

唐科告诉记者,在筹备影片的过程中,关于“为什么半个世纪没有解决的事用了三年解决了”的答案渐渐在他心中变得清晰起来。

“最终还是人的问题,我们在当地看到的是每一个当地干部的努力拼搏。电影要用全景式的表达,塑造一批县乡村中青年干部的形象。”

宁敬武对于影片有一个更形象化的比喻——影片形成了像清明上河图一样的历史长卷。

他告诉记者,影片涉及到县、乡、村各级干部以及贫困户。影片中有名有姓,有人物性格的角色在15个以上。“我想让观众看到黄河边上各个层级的人对于脱贫工程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宁敬武要体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和牺牲,关键是表达清楚关于扶贫工程的方法论。

“在脱贫攻坚工程中,固然凝聚了各级干部的个人努力和心血,但面对复杂和多样性的贫穷根源,以及全面性的系统工程,仅凭个人的热情、奋斗,是不可能全面成功的。”宁敬武表示,全景式的表达可以具有科学性、创新性的脱贫方法论。

为何要以金融服务为主线?

无论如何,《千顷澄碧的时代》毕竟是一部故事片,承载的东西再多,还是要有主次之分。“啥都说,等于啥都没说。”在唐科看来,对于一部电影而言,这是十分危险的。而随着宁敬武的加入,影片的故

事确立了以金融扶贫为主线,串联起所有的人物和故事。

影片的主人公之一,便是青年证监会干部芦靖生。“芦靖生这个人是个真实证监会干部的集合,可以说,影片中的主要角色都可以找到原型,他们虽然是虚构的人物,但他们身上每个细节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除了采访素材源自证监会干部,宁敬武多年前在金融行业的从业经历,也让他有自信和能力把握好金融扶贫这条主线。

“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发明了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穷人脱贫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今,中国的扶贫工程同样运用了大量金融、科技创新。”在宁敬武看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是可以被世界理解、借鉴的系统性方法,这一代人所运用的方式,是一种可以和世界沟通的方式,因此他希望可以在影片中表现出来。

对于《千顷澄碧的时代》,唐科自信地表示影片非常具有深度。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来自宁敬武。拍好这部影片,需要导演对于贫穷这一现象有着社会学的认知,宁敬武恰恰在具备这方面知识储备的同时,还是一个在艺术上成熟、理性的导演。而身为制片人的周昀同样表示,宁敬武在艺术上可以用扎实的叙事风格和诗化化的电影语汇相结合,直抵人心。

为何要采取“双男主”来突出表现父子式情感?

《千顷澄碧的时代》的故事以兰考县脱贫攻坚战为基础,其中的素材几乎均来源于采访,因此在创作上不会像一般意义上的影片那样有非常多的巧合性戏剧冲突。但是,如果把观察的标尺聚焦在细节上,仍可以看出很多故事片的特性。

影片中,一心想在学术中寻找中国农村出路的证监会干部芦靖生和从基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县委副书记范中州是典型的双男主设置。而从“洋秀才”和“土八路”这样的搭档设置中,便可窥见二人的矛盾冲突。

“芦靖生和范中州最后的和解,可以视为一种类似父子式的和解。”宁敬武告诉记者,父子之间的沟通、和解,是每一名普通观众都很容易理解的情感。“我们想借着父子沟通这种模式,观中国农村脱贫中的问题、困境、观念的冲突等传递出来,让影片更具观赏性。毕竟,这是一部故事片。”在宁敬武心中,有了这两人的情感关系,影片就有了故事片的魅力。观众通过这两个人很容易能够联想到自家的父子沟通问题,更容易让影片和观众产生共鸣。

在采访中,记者深深地感受到监制唐科、制片人周昀和导演宁敬武等人的创作热情和身为电影人的担当。正如他们三人在创作中被当地干部群众的精神所打动一样。

在多年之后,也许会有更多的电影人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而如今脱贫的地区也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基础。我们当然不应该感谢贫穷,但我们更应该感谢那些经受贫穷仍不甘挫败的心灵。